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Sino-Japanese War: A Content Analysis of Articles in Monthly Popular Magazines, 1936–1938

Kimihiko BABA

Abstract: In the year following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major Chinese cities—including Nanjing, Xuzhou, Wuhan, and Guangzhou—fell to Japanese forces in succession as the war spread from North China to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The nature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underwent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what began as a localized clash escalated into a full-scale war, then expanded from a bilateral confrontation into a component of a global conflict, and finally evolved from a conventional military engagement into a total war driven by national mobilization. During this stage of full-scale warfare, how did the Japanese public perceive the war, and how did their perceptions evolve as events unfolded in succession? This study seeks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of military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ead, it focuses on the Japanese public's perception of China. Specifically, it analyzes China-related content from ten popular monthly magazines published in Tokyo between 1936 and 1938, a three-year period spanning the prelude to and the early phase of the war. It encompasses 1,351 relevant articles written by 736 contributors. Each author's arguments a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to discern their underlying positions and to trace shifts in opinion as the war progressed. By analyzi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mass media reports on the Sino-Japanese War, this study aims to elucidate how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Japan—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China specialists ("Shina experts"), soldiers, and writers—formed their collective perceptions of China. It further highlights how these perceptions diverged from earlier understandings and how they subsequently evolved.

Keywords: Sino-Japanese Full-scale War, Popular Magazines, Resistance Movement Against Japan, Xi'an Incident, Theory of Re-understanding China

Author: Kimihiko BABA is a former Editor-in-Chief at Iwanami Shoten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apanese Studies and the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published monographs include *The Postwar Japanese Perception of China: From Japan's Defeat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and *The Sower: Editorial Records of the Heisei Era*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among others.

日本全面侵華前後的輿論建構

——基於對1936—1938年日本大眾期刊的考察^①

馬場公彥

[摘要]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南京、徐州、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戰火自華北蔓延至華中、華南地區。中日衝突的性質也隨之轉變：從局部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由兩國間的戰爭擴大為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並從單純的軍事對抗升級為國家總動員體制下的總體戰。在此戰爭全面爆發階段，日本國民如何認識這場戰爭？其戰爭認知又如何隨戰局演變？本研究嘗試突破傳統軍事史、外交史及國際關係史視角，轉而從日本國民對華認知的角度切入，具體以開戰前後的1936—1938年整3年期間在日本東京發行的10種月刊大眾雜誌為分析對象，考察了共計736名撰稿人發表的1351篇相關文章。根據每位作者在具體文章中的主張進行定性分析，明確其立論傾向及隨局勢變化而產生的觀點轉向。通過分析當時日本大眾媒體刊載的全面侵華戰爭相關報導，旨在闡明全面侵華戰爭開戰前後日本政軍界領導人、中國專家（“中國通”）、參戰士兵及作家等日本人群體對中國的整體認知的形成過程、與既有對華認知的差異以及後續發展軌跡。

[關鍵詞] 侵華戰爭 大眾雜誌 抗日運動 西安事變 中國再認識論

[作者簡介] 馬場公彥，原日本岩波書店總編輯，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及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已出版專著有：《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中日復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播種人：平成時代編輯實錄》（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等。

①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近代以來日本對華認知的資料庫建設及對華戰略和行為研究”（24&ZD310）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研究目的與方法

以1937年7月7日爆發的盧溝橋事變為導火索，全面侵華戰爭最終演變為全面戰爭。當時的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這裏的“日本人”，其對華認知體系由多個不同階層構成，具體包括：作為政策、戰略、戰術制定及執行者的內閣成員、政黨政治家、外交官、校級及以上軍官；學者、記者、作家等知識分子群體；以及其他普通國民。尤其在戰時體制下，軍部勢力取代政黨政治體制崛起，其意志與行動在政策制定中佔據主導地位，進而裹挾知識分子和普通國民，形成了舉國一致的國家總動員體制。

在全面侵華戰爭時期，國民輿論對戰爭走勢的影響不容忽視。既往的全面侵華戰爭史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幾個維度：①聚焦於日本軍部和政府對華戰略決策過程與具體軍事行動的研究^①。②從日本對華外交及中國對日外交角度考察戰爭走勢的研究^②。③以國際關係視角分析戰爭爆發原因及戰事推進的研究^③。④從經濟戰、貨幣金融戰、資源獲取戰視角展開的研究^④。⑤從國際關係、外交、經濟關係、文化關係等多維度展開的綜合研究^⑤。然而，這些研究普遍缺乏對國民輿論形成的關注。作為國民對華認知的一個側面，雖有研究探討知識分子在戰爭爆發前的對華認知^⑥，但都局限於個別知識分子或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中國學界近十餘年來對近代日本人對華認知的研究逐漸興起，成果豐碩^⑦，但針對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⑧。

為探究全面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對華認知的實情，當時的大眾傳播媒介——包括紙質媒體（報紙、雜誌、書籍）、聲音媒體（廣播、有線廣播、唱片）以及影像媒體（新聞電影、劇場用紀錄電影）——是重要線索。在這些媒介形態中，以往的絕大多數研究都集中於對報紙的分析^⑨，而對雜誌文章的研究不僅數量有限，且考察時段較為局限^⑩。因此，本研究將以當時對國民輿論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眾期刊為對象，通過分析刊載的全面侵華戰爭相關文章，探討撰稿知識分子的對華認知。

本文所稱“大眾期刊”，即關東大地震後大眾文化普及與大眾消費社會化背景下，書籍價格逐漸低廉化，雜誌讀者從知識分子擴展到一般報紙訂閱階層時期的大眾化雜誌。這類雜誌的種類、頁數、發行量等均呈現出增多的繁榮趨勢^⑪。此類雜誌主要為綜合類期刊（多為月刊），以

- ① 秦郁彥：『日中戰爭史』，東京：河出書房，1961年。引自該著作時採用2011年河出書房新社出版的複製新版。
- ② 井上壽一：「政黨政治の再編と外交の修復」；鹿錫俊：「東亞新秩序をめぐる日中關係」；森茂樹：「革新外交」と日米開戰」，井上壽一編：『日本的外交 外交史 戰前編』，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第185—260頁。
- ③ 加藤陽子：『滿洲事變から日中戦争へ』，東京：岩波新書，2007年。
- ④ 山中恒：『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史』，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
- ⑤ 波多野澄雄、中村元哉編：『日中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8年。
- ⑥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東京：研文出版，1981年；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東京：以文社，2011年等。
- ⑦ 主要研究成果有：楊棟樑主編：『近代以來日本人的中國觀』（六卷本），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 ⑧ 王美平：《日本對中國的認知演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內容僅覆蓋至九一八事變之前。
- ⑨ 以中國發表的相關研究為例，有針對日本發行報紙的研究，如丁果：〈“九一八事變”與《朝日新聞》〉，《外國問題研究》，1988年第3期；有對日本報社發行的華文報紙的研究如王曉嵐、戴建兵：〈《盛京時報》關於七七事變報導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3期；還有對中國報社發行的華文報紙的研究如李學智：〈“七七事變”前後《大公報》的對日觀察與對日態度〉，《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王天根：〈盧溝橋事變與《大公報》新聞時評及其輿論聚焦〉，《蘭州學刊》，2016年第16期；以及對日本報社在華發行的華文報紙、日文報紙及通訊社的研究如王向遠：〈日本對華文化侵略與在華通信報刊〉，《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等。
- ⑩ 西村成雄：「日中戦争前夜の中國分析」，『「帝國」日本の學知 東洋學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93—332頁；根岸智代：「1930年代半ば中國再認識をめぐる日本の論壇」，《現代中國研究》，35.36合刊，2015年；劉妍：「雜誌『改造』と中國の關連性について」，《神戸松蔭女子學院大學研究紀要・文學部篇》，2017年第3期等。
- ⑪ 大澤聰：『批評メディア論——戰前期日本の論壇と文壇』，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第23—30頁。

供稿的知識分子為中心形成了特定的言論場域。

無論是雜誌還是報紙、廣播、電影等其他媒介形態，這一時期媒體對受眾的信息傳播都是單向的。信息傳播後，在讀者、觀眾間形成何種輿論或對華情感，有待探究。本研究對日本言論界關於中國的論述及其歷時性變化進行了宏觀的把握。之所以選擇包括綜合雜誌在內的大眾雜誌作為研究對象，因其與行業雜誌不同，是以大眾為讀者對象，反映了大眾的關注點、知識水平及輿論動態。

本研究以1936至1938年發行的10種綜合月刊為對象，重點分析當時被稱為“四大綜合雜誌”的《文藝春秋》《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並補充考察6種雖不屬大眾雜誌但對把握輿論動向具有參考價值的刊物。這些雜誌的發行方、創停刊時間、發行量等基本信息如下^①：

雜誌名	內容
《日本評論》	日本評論社（東京），1926年以《經濟往來》之名創刊，1935年10月更名《日本評論》。1946年5月復刊，1951年6月停刊，發行量：5萬部（1936年3月）→4萬部（1938年3月）。自稱“高級大眾雜誌”，主筆室伏高信撰稿較多。
《改造》	改造社（東京），社長山本實彥，1919年創刊，1944年3月休刊，1946年1月復刊，1955年2月停刊。發行量：6.5萬部（1937年9月）→7.5萬部（1938年1月）。具有左派傾向，社主山本實彥的個性和人脈影響顯著。
《中央公論》	中央公論社（東京），1887年以《反省會雜誌》之名創刊，1897年更名《中央公論》。1944年7月停刊，1946年1月復刊，至今仍在發行。發行量7.2萬部（1937年9月）→8萬部（1938年1月）→7.3萬部（1938年3月）→7萬部（1938年6月），平衡刊登左右兩派論客的文章。
《文藝春秋》	文藝春秋社（東京），1923年1月創刊，至今仍在發行。發行量：9.6萬部（1936年10月）→13萬部（1938年6月）。時事評論相對較少，文藝相關文章較多，盧溝橋事變後全面侵華戰爭相關文章激增。
<i>Current History</i>	國民經濟研究所（東京），1934年10月創刊，1938年停刊。發行量：1000部（1939年8月），為實業類經濟雜誌，財界人士撰稿較多，內容涉及日占區的產業開發及經濟。
《文明協會新聞》	財團法人民間協會（東京，1909年創立），1928年1月創刊。發行量：1100部（1939年4月），主張協調外交，多海外撰稿或轉載翻譯文章。
《日本及日本人》	金尾文淵堂（東京），1907年1月創刊，2004年1月停刊。繼承正教社《日本人》雜誌和陸羯南發行的《日本新聞》，1923年秋前由三宅雪嶺主持。發行量：3055部（1936年3月）→3000部（1937年8月）。

① 發行部數參照小林昌樹：『雜誌新聞發行部數事典（增補改訂普及版）』，東京：金澤文圖閣，2020年，僅引用了本研究涉及1936—1938年期間的部數。

雜誌名	內容
《我觀・東大陸》	我觀社（東京），由曾主持《日本及日本人》的三宅雪嶺於1923年創辦，1937年6月更名為《東大陸》，1945年11、12月合刊號停刊。發行量：《我觀》4000部（1936年4月）→《東大陸》3800部（1939年7月）。《我觀・東大陸》與《日本及日本人》均具有強烈國粹主義色彩，標榜皇道主義。
《大義》	《大義》《日本婦女》編輯部（東京），1937年1月改由大日本國防婦女會總本部發行。1934年3月創刊，1938年12月停刊。發行量：2000部（1939年3月），面向後方軍人家庭，軍國主義色彩濃厚，旨在宣揚日軍戰果以鼓舞士氣。
《明倫》	明倫會〔東京，1933年以“在鄉軍人（退役後回到家鄉居住，但仍保有後備役身份的軍人）”為主成立的超國家主義團體〕，1932年創刊，發行量：1200部（1936年3月），從國粹主義立場出發，多軍人撰稿，對全面侵華戰爭持好戰態度。

經統計，這10本雜誌在3年間刊登的全面侵華戰爭相關文章總量達1351篇。其中四大綜合雜誌的文章數量尤為突出，占總數的70%以上。特別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1937年9月起，相關文章數量驟增，幾乎每月都推出超過常規刊頁數的增刊，這一趨勢持續至同年年底。

戰爭爆發後，戰火持續蔓延，戰場不斷擴大。本文以全面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後3年為研究時段，以改變中日關係與戰局的關鍵歷史事件為節點，可將其劃分為6個階段（每階段約為半年）。以下，對每一階段的內容展開定性分析^①。

一、華北局勢的變化（1936年1期—7期）

（一）對華北局勢的關注升溫

這一時期大眾雜誌上涉華文章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北支”（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5省）和“滿洲”及其周邊地區的局勢與動向。這一點從該時期刊登的92篇涉華文章中，華北主題占22篇、“滿洲”（包括“滿蒙”“滿鮮”“滿露”“露滿”“日滿”“蒙古”等）主題占20篇的比例即可看出。

關於華北局勢，清末曾在北京參與當地員警教育並參與策劃“滿蒙獨立”的川島浪速敵視國民政府，主張阻止英美在華勢力的擴張。他認為“不應依賴自私而狡猾的中國人的自主性，抓住時機儘早建立能完全代表支那的政權，才是日本的當務之急”^②。

日本陸軍中的著名中國通、特務機關成員土肥原賢二則指出蘇聯軍事力量和工業發展及受其影響頑強抗日的中國共產主義勢力對日本的威脅。^③這一時期，日本在推行“華北分離工作”及

① 對歷史事件時期的確定及歷史術語的使用依據近代日中關係史年表編輯委員會：『近代日中關係史年表1799—1949』，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與本文相關聯的研究可參見馬場公彥「日中全面戰爭開戰前後における對中認識の形成と變化」（『中國研究月報』2025年3期）。該研究為基於同一主題的綜合研究，對雜誌刊載文章進行了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本研究則側重於細化深入的定性分析，篇幅為該研究定性分析部分的3倍。

② 川島浪速：「北支の情勢に流るる基本精神」，『日本及日本人』，1936年第3期，第15—19頁。

③ 土肥原賢二：「北支から歸りて」，『日本評論』，1936年第5期，第419—421頁。

“華北自治運動”時，所警惕的中國對抗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國民政府試圖強化影響力而主導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二是既不承認“華北自治運動”、也不服從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學生抗日運動。^①此外，英國對華援助、中蘇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等國際社會的動向，也引發日本擔憂。^②

（二）抗日運動的實情

面對國際局勢，實業家增田正雄流露出危機感：“如今在支那，蘇、英、美、支的對日包圍網已經形成。”^③在此背景下，有文章將中國小學使用的抗日教材視為“反日反滿教育”的鐵證，詳細介紹了課程與教材內容。^④此後，抗日教材持續被視為抗日運動的“元兇”之一。^⑤

滿鐵上海事務所顧問鈴江言一的論文基於華北民眾貧困的現狀，指出日本不應“共同防共”，而應“滋潤”民眾而非剝削。他還尖銳地指出所謂“親日派”的本質：“依附於日本的中國政客和軍人，大多不是親日派，而是媚日派。親日需有政策基礎，而媚日的人顧名思義，他們只會為了一己私利而魚肉百姓。”^⑥

另一方面，偽滿問題的相關文章多為該地區的考察遊記及對中俄邊境地區的局勢、殖民與移民政策的分析報導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偽滿洲國產業振興與經濟發展的文章，反映出言論界對“日滿經濟集團”構建的濃厚興趣。實業家仲矢虎夫指出，日本派往偽滿的非熟練工和農業移民受到同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當地人排擠。仲矢指出：“日本的滿洲移民政策，重點並非解決‘人口問題’，而是具有國防（如戰時在當地徵兵）與警備目的的行為。”這與“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口號形成鮮明對比，展現了一種冷靜而悲觀的預期。^⑦

關於抗日學生運動，蔣介石的智囊陶希聖認為這是受日本對華侵略刺激而產生的“五四運動”以來，又一次超越黨派的獨立自主的民族運動。^⑧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則批判日本提倡的“中日合作”與“大亞洲主義”實為“將全亞洲民族置於日本式統制之下”的帝國主義侵略^⑨。針對日本自“九一八”事變後推行“華北分離工作”的侵華行徑，日本評論家室伏高信與中國學者胡適通過兩輪公開書信展開論戰，相關內容刊載於《日本評論》。^⑩

二、抗日運動的激化（1936年8—12期）

這一時期大眾雜誌的涉華文章主要聚焦於抗日運動及襲擊事件。該時期共刊登涉華文章122篇，其中涉及抵制日貨運動（宣導國貨運動）、“排日”、抗日運動的有18篇，與成都事件等襲擊事件相關的有9篇。

關於成都事件，《日本評論》1936年11期刊載了記者深川經二的遺稿^⑪，駐地記者田知花信量採寫了記錄當時慘烈見聞的現場報導，稱“萬餘民眾皆為真兇”，並表示“必須以支那的抗日

① 平貞藏：「北支自治と學生運動」，《改造》，1936年第2期，第283—291頁。

② 長岡克曉：「北支の不安定とわが對支政策」，《中央公論》，1936年第7期，第273—283頁。

③ 增田正雄：「支那に於ける對日包圍陣の結成」，《日本及日本人》，1936年第7期，第7—17頁。

④ （無署名）：「支那小學校の排日反滿教育」，《文明協會ニュース》，1936年第2期，第43—55頁。

⑤ 小田嶽夫：「抗日教科書」，《文藝春秋》，1936年第11期，第68—85頁。

⑥ 鈴江言一：「共產黨の西北經路と華北の諸問題」，《改造》，1936年第5期，第199—207頁。

⑦ 仲矢虎夫：「日滿經濟ブロックの再吟味」，《我觀》，1936年第2期，第48—56頁。

⑧ 陶希聖：「中國今日の學生運動」，《日本評論》，1936年第2期，第97—103頁。

⑨ 胡漢民：「われ等の大亞洲主義」，《日本評論》，1936年第5期，第172—179頁。

⑩ 關於『日本評論』刊載的胡適：「日本國民に告ぐ」，1935年第11期、室伏高信：「胡適之に答ふる書」，1935年第12期、胡適：「室伏高信先生に答える」，1936年第1期、室伏高信：「再び胡適之に答ふる書」，1936年第2期等文獻，詳見張競、村田雄二郎編：『日中の120年 文藝・評論作品選 敵か友か 1925—1936』，岩波書店，2016年，第244—267頁。

⑪ 深田經二：「死の巴蜀行」，《日本評論》，1936年第11期，第268—280頁。

情緒不可根除為前提制定對華政策”^①。此類報導中普遍使用了“暴虐”“暴戾”等貶義修辭。

針對抗日運動的背景因素，新聞界的“中國通”們撰寫了多篇詳細的動態分析。同盟通信的下條雄三認為，起因是國民政府自“九一八”事變後推行的對日“革命外交”，他揭示了媒體工作中的抗日宣傳情況，認為其中毫無對日態度好轉的可能性。^②村上知行和波多野乾一則梳理了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佈《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後，以北平學生、上海文化界為核心的抗日統一戰線逐步形成的經過。^③

在應對抗日運動方面，前陸軍大臣、陸軍大將荒木貞夫認為日本作為“亞洲盟主”，應當“彰顯國體明徵”，“實現皇道精神”，以“舉國一致的精神力量”對抗英蘇。^④陸軍中將石光真臣基於“中國人缺乏國家觀念”且“奉行利己主義”的偏見，提出應放棄依賴立場搖擺的蔣介石政權，不懼英美俄壓力，培養親日派以改造南京政府。^⑤

還有觀點呼籲應警惕全國範圍內的“赤化”趨勢^⑥，主張強化與國民政府“協同防共”^⑦。但同時也有部分有力觀點認為，抗日運動實為“九一八”事變的產物^⑧，即便要求國民政府鎮壓亦難奏效^⑨。故有觀點主張放棄對南京政府親日政策的期待，以強硬姿態開展對華談判。^⑩甚至有極端意見認為，面對激化的抗日情緒，為了未來的“親善”，不惜開戰。^⑪與此同時，基於對開戰的預判，有關中國的國防戰略和軍備的分析報告陸續刊發。^⑫此外，實業界也發出了務實的聲音，認為應擺脫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剝削，致力於以農村復興為中心的國民生活援助。^⑬

針對日方解讀，陶希聖認為當前的動盪實為帝國主義時代下“民族國家產生的陣痛”，批評“日本政府將中華民族的覺醒簡單地歸結為排日或抗日”。^⑭全國救國聯合會的章乃器等人則表示，該運動係對日本干擾民族獨立的愛國自衛運動，並非受黨派指令的抗日行為。^⑮原勝也通過直接採訪章乃器傳達了抗日運動的真正意圖。^⑯

三、中國統一化論與再認識論（1937年1—7期）

（一）西安事變的真相

這一時期大眾雜誌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對綏遠事件與西安事變中抗日勢力的動態分析。該時期刊登的126篇涉華文章中，有5篇與綏遠事件相關，11篇涉及“滿蒙”及對蘇議題。對於西安事

① 田知花信量：「暴虐の現地を見る」，《『改造』》，1936年第9期，第359—365頁。

② 下條雄三：「抗日支那の外交と國防」，《『改造』》，1936年第11期，第140—147頁。

③ 村上知行：「中國のインテリゲンチヤ」，《『中央公論』》，1936年第9期；波多野乾一：「抗日思想の諸要因」，《『中央公論』》，1936年第10期，第221—231頁。

④ 荒木貞夫：「支那抗日事件解決の根本問題」，《『日本及日本人』》，1936年第11期，第7—9頁。

⑤ 石光真臣：「対支私見」，《『明倫』》，1936年第11期，第10—21頁。

⑥ 大塚虎雄等：「支那の赤化を語る座談會」，《『文藝春秋』》，1936年第12期，第100—126頁。

⑦ 大藏公望等：「抗日支那をどうするか座談會」，《『文藝春秋』》，1936年第11期，第106—126頁。

⑧ 太田宇之助：「支那統一の大業成らんとす」，《『日本評論』》，1936年第9期，第354—358頁。

⑨ 大西齋：「抗日運動の現勢」，《『改造』》，1936年第9期，第354—358頁。

⑩ 賴克己：「日支國交の調整とは何か」，《『日本及日本人』》，1936年第11期，第14—19頁。

⑪ 馬場恒吾：「日支親善論」，《『改造』》，1936年第11期，第73—79頁。

⑫ 齋藤直幹：「抗日戰備の新情勢」，《『我觀』》，1936年第11期，第95—102頁；布利秋：「支那抗日武裝の現勢」，《『改造』》，1936年第12期，第214—224頁等。

⑬ 十河信二：「對支政策の質的轉換」，《『文藝春秋』》，1936年第11期，第52—61頁。

⑭ 陶希聖：「中國の出路與中日關係」，《『日本評論』》，1936年第12期，第152—159頁。

⑮ 章乃器等：「上海現地 中國人時局座談會」，《『改造』》，1936年第11期，第248—259頁。

⑯ 原勝：「抗日戰線の巨頭と語る」，《『日本評論』》，1936年第12期，第170—175頁。

變，各雜誌都加大報導力度組織特輯，相關報導多達26篇。另有13篇文章分別分析了西安事變後的抗日運動及國共合作動向，包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國軍隊及南京政府的抗日外交、國民黨第五屆三中全會召開（1937年2月）等議題。

關於西安事變，各刊在1937年1期密集動員了“中國通”們來撰稿，成為了“檢驗他們（中國通）對華知識廣度、深度、準確性以及判斷力的絕佳試金石”^①。

對四大綜合雜誌1937年1期的報導進行梳理可發現：《中央公論》刊發大阪朝日新聞尾崎秀實的文章稱，事變主謀為張學良，其指揮的15萬東北軍因財政困窘，在共產黨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號召下發動兵變。蔣介石雖生死未卜，但其掌控軍權、黨權與財權，故推測有政治交易發生。^②大阪每日新聞的波多野乾一分析了輔佐蔣介石的部下及政敵和軍敵，斷言其“無可繼任者”^③。村上知行強調不可低估中國民眾的力量，指出華北“防共”政策被中國人視為“日本欲征服中國，並將其當做對抗蘇聯的‘排頭兵’”之圖謀，並詳述了平津日軍演習（1936年10月26日—11月4日）將轉為實戰、“綏遠已成民族抗敵前線”等民間傳言。^④

《改造》雜誌的作者群體（原勝、大西齋、山上正義、波多野乾一、山川均等）——原勝將抗日鬥爭定性為“殖民地與‘從屬國’反抗帝國主義奴役的民族鬥爭”^⑤；大西齋認為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對共產國際指令的響應，旨在建立聯蘇“容共”的抗日戰線^⑥；山上正義指出張學良已成為完全“中共代理人”^⑦；波多野乾一認為“容共”已經擴大至偽滿抗日人民戰線^⑧；山川均稱11月25日簽訂的《日德防共協定》激化了抗日情緒，並斷言日本的對華政策“唯有武力解決”一條路可走^⑨。

《日本評論》中，淺野要（原勝的本名）預測中國將倒退至封建軍閥內戰^⑩，而主編室伏高信則主張日本應“不干涉國民政府統一進程”，從而彰顯“東亞穩定者的穩重”^⑪。

（二）中國再認識論的展開

隨著西安事變真相漸明，傳統的對華認知亟待修正，“中國通”也面臨更新換代。值得注意的是，新晉“中國通”的記者與評論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左翼學者。

縱覽1937年2期以後各刊物關於西安事變的相關論述可見，在事實認定層面，同盟通信社上海分局長松本重治憑藉其在地信源網絡的優勢，以時間線形式詳盡還原了事變後的局勢演變^⑫，指出：“正如‘二·二六’事件所示，對事件性質的判斷不應僅止於事件本身的經過，而應基於其根本誘因所激發的連鎖反應之廣度與深度”，並強調事變本質在於“揚棄‘安內攘外’主義”，呼籲“重新認識南京政府的價值”。^⑬

關於事變對日本的歷史轉折意義及應對策略，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給出了清晰論

① 尾瀨介人：「支那通メンタル・テスト」，《『日本評論』》，1937年第2期，第329—337頁。

② 尾崎秀實：「張學良クーデターの意義」，《『中央公論』》，1937年第1期，第406—414頁。

③ 波多野乾一：「蔣介石を継ぐ者！？」，《『中央公論』》，1937年第1期，第417—422頁。

④ 村上知行：「蔣・張背後の民衆」，《『中央公論』》，1937年第1期，第423—433頁。

⑤ 原勝：「支那抗日民族闘争の根底」，《『改造』》，1937年第1期，第113—119頁。

⑥ 大西齋：「西安事件と支那の前途」，《『改造』》，1937年第1期，第89—92頁。

⑦ 山上正義：「西張學良の役割」，《『改造』》，1937年第1期，第93—95頁。

⑧ 波多野乾一：「『容共』と西安事件」，《『改造』》，1937年第1期，第96—102頁。

⑨ 山川均：「打倒蔣介石のクーデター」，《『改造』》，1937年第1期，第104—109頁。

⑩ 淺野要：「張學良クーデターの検討」，《『日本評論』》，1937年第1期，第2—6頁。

⑪ 室伏高信：「學良事件と中國及び日本」，《『日本評論』》，1937年第1期，第6—8頁。

⑫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中公文庫，1989年（初版為1975年），下卷，第9—51頁。

⑬ 松本重治：「西安事變の中間報告」，《『改造』》，1937年第2期，第76—92頁。

斷：西安事變加深了抗日意識，南京政府將作為“國家統一事業的承擔者”發揮實力，中國將經由資本主義化建成現代統一國家並抵抗帝國主義擴張。日本對華政策除正視這一點並予以協助外別無選擇。^①

右翼刊物亦承認事變背後存在高漲的抗日民族主義。正因如此，有論者主張日本應“對南京政府採取更具主導性的態度”^②。另有分析指出，“排日”運動背後存在日英經濟競爭因素，建議採取親美聯蘇策略以離間英國^③。但鮮見對西安事變的直接報導或分析，關注重心反集中於被日本視為生命線的“滿蒙地區”——特別是綏遠事件的進展。學界憂慮南京政府正將收復失地運動從華北擴展至“滿蒙”^④。同時，文章還對“華北自治運動”陷入停滯、“冀察政權”受南京政府干涉加劇，日本對華北經濟滲透受阻等現狀表示擔憂^⑤。還有文章指出，隨著南京政府推動“冀東自治政府”解體及冀察政務委員會中央化進程^⑥，華北土地交易禁令及對日經濟合作抵制日趨嚴厲^⑦。西安事變引發的新“北支問題”集中體現為“冀東自治政府”解體導致的華北及偽滿地區“統治”難度上升，日本方面只能將渺茫的希望寄託於“冀東自治政府”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合併。^⑧

有關中國方面，實藤惠秀通過分析中國媒體和言論界的構成與思潮，揭示了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與抗日運動的內在邏輯。^⑨中國愛國主義自由派知識分子王造時警示，若日本將政策繼續下去，中日全面戰爭將不可避免。^⑩記者陳博生則呼籲日本在尊重兩國獨立、領土主權及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外交的一元化。^⑪同為大公報主筆的張幟章則批判日本以本國利益優先的亞洲主義。^⑫關於西安事變本身，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齡營救過程的親筆記錄通過《紐約時報》轉載得以公開。^⑬

（三）馬克思主義者的言論活動

西安事變後，日本言論界左翼學者及馬克思主義者的活躍態勢，與當時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幾近癱瘓、共產主義運動遭非法化的境況形成鮮明反差。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實則包含多重身份：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三木清、三枝博音、船山信一）；脫黨後持續左翼活動的前共產黨員（山川均、片山哲）；赴偽滿任職於滿鐵調查部（1938年4月改組設立）及東亞研究所（1938年9月設立）從事實地調研的學者（細川嘉六、鈴江言一、堀江邑一、具島兼三郎、岡崎三郎、大塚令三、大上末廣）；昭和研究会（下設“支那問題研究会”成立於1937年3月）成員（尾崎秀實、波多野乾一、大西齋）；轉向為右翼政治家及大政翼贊運動者（立野信之、赤松克麿）；以及平貞藏、鹿地亘等其他人士。若將上述人員統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群體，可確認身份的撰稿者即達38人（占本文收集736名撰稿者的5.2%），其發表文章為111篇（占總量1351篇的8.2%）。

① 矢內原忠雄：「支那問題の所在」，《中央公論》，1937年第2期，第4—17頁。

② 中山優：「今後の國民政府は如何う動く？」，《我觀》，1937年第2期，第20—28頁。

③ 稻村隆一：「日支新外交論」，《我觀》，1937年第3期，第21—26頁。

④ 田中香苗：「綏遠事件と南京政權」，《我觀》，1937年第1期，第166—175頁。

⑤ 大山卯次郎：「冀東及び冀察の現狀に於て」，《明倫》，1937年1期，第64—70頁。

⑥ 中村常三：「冀東政府解消問題と日本」，《東大陸》，1937年第6期，第120—125頁。

⑦ 德富雪夫：「北支中央化の進展」，《東大陸》，1937年第7期，第56—60頁。

⑧ 田中國重：「北支問題の検討」，《明倫》，1937年第5期，第4—8頁。

⑨ 實藤惠秀：「現在中國の言論界」，《我觀》，1937年第2期，第106—113頁。

⑩ 王造時：「日本國民に警告するの書」，《改造》，1937年第2期，第234—244頁。

⑪ 陳博生：「汪兆銘と今後の日中關係」，《日本評論》，1937年第2期，第92—96頁。

⑫ 張幟章：「日支關係と東洋の將來」，《文藝春秋》，1937年第3期，第262—265頁。

⑬ 宋美齡：「蔣介石を救ひ出す迄」、蔣介石：「西安監禁半月記」，《中央公論》，1937年第6期，第195—228頁。

馬克思主義者著述活躍的背景在於：對共產主義者的鎮壓導致國內社會主義運動窒息，獄中日共政治犯如佐野學、鍋山貞親等集體轉向，社會大眾黨及大政翼贊會淪為戰爭協力活動。在此背景下，部分原馬克思主義者或日共成員轉向將社會主義理論應用於政策科學領域，從國家社會主義立場繼續開展研究。具體表現為：聚焦生產力理論以強化軍備國力，借鑒蘇聯長期經濟計畫模式。其中多數人赴偽滿參與滿鐵工作，致力於統制經濟體系構建與生產力擴充計畫，^①或任職於企劃院（1937年10月設立）制定物資動員計畫與國家總動員體制，亦或參與昭和研究所構建“東亞新秩序”及“大東亞共榮圈”構想。^②他們以滿鐵調查部、東亞研究所、昭和研究所等研究機構和智庫的專家或官僚身份，從事與全面侵華戰爭相關的調查、研究與寫作。^③

包括自由主義者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兩種路徑維繫生存空間：“九一八”事變後致力於政策科學方案制定；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初期提出“東亞新秩序論”以強化“聖戰”話語。但隨著言論鎮壓加劇，其研究、教育及著述活動再遭限制。典型的鎮壓事件包括：矢內原忠雄辭去東京帝大教授（1937年12月1日）、河合榮治郎著作被禁、停職並遭起訴（1938年10月5日、1939年1月28日、2月28日）、昭和研究所解散（1940年11月19日）、佐爾格事件牽連尾崎秀實被捕處決（1941年10月15日被捕，11月7日處刑）、滿鐵調查部大規模舉報逮捕與調職（1942—1943年“滿鐵調查部事件”）、《中央公論》《改造》停刊（1944年3月、6月）。在此過程中，社會主義者與左翼學者圍繞當代中國問題的言論被徹底壓制。

（四）西安事變後的輿論關注

從大眾雜誌相關論述觀察，西安事變後日本言論界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其前提是重新認識以統一國家建設為目標的中國。

1. 關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決議反映的內外政策方針。^④

2. 追蹤抗日勢力中的中共動向。

特別是埃德加·斯諾與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關於對日政策及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的論述刊載於《改造》雜誌^⑤。尾崎秀實則關注第二次國共合作背景下，中共轉向經濟建設與國防計畫的內部動向^⑥。

3. 聚焦日本對華政策的制定。

日本經濟界為改善關係所做的舉措包括派出由13名財界人士組成的經濟使節團（3月12日至29日），以圖重塑對華認知並推進經濟合作。^⑦在偽滿地區，日本實施了為期五年的產業開發計畫，包括產業培育、統制經濟、國防經濟化及推進“日滿中經濟集團”建設。^⑧但尾崎秀實指出，“日中經濟合作論”本質源於“日本單方面的經濟訴求”且與英國等列強的經濟擴張存在競

① 疋田康行：「『大東亞共榮圈』における経済統制と企業」、杉山伸也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帝国」の経済学』，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57—302頁。

② 岡崎哲二：「長期経済計画と産業開発」，杉山伸也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帝国」の経済学』，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25—331頁。

③ 井村哲郎：「日本の中国調査機関」，『「帝国」日本の学知 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57—398頁。

④ 海野均：「三中全会と容共抗日の真相」，『日本及日本人』，1937年第4期，第43—51頁、馬場清保：「支那の統一化と対日方針」，『カレント・ヒストリー』，1937年第4期，第33—36頁、田知花信量：「三中全会と対日政策」，『改造』，1937年第4期，第156—163頁等。

⑤ 埃德加·斯諾：「中国共産党の対日政策」、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西安事变と国共合作」，『改造』，1937年第6期，第144—171頁。

⑥ 尾崎秀實：「轉換期支那の基本問題」，『中央公論』，1937年第7期，第69—80頁。

⑦ 大村増太郎：「日支経済の提携の基底」，『文藝春秋』，1937年第3期，第40—47頁。

⑧ 鈴木武雄：「満洲産業の新段階」，『中央公論』，1937年第7期，第62—68頁。

爭關係。^①

圍繞中日談判展開的政界動向方面，中日外長王寵惠與佐藤尚武履新，佐藤向王寵惠表明基於平等立場改善關係至合作的意願（3月8日）。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對中日外交重啟表示期待^②，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強調，在對華認知被迫改變的當下，更應回歸“互惠平等、主權尊重”原則推進談判^③。雙方都表示在國民互信的基礎上，反對主權侵害，解散“冀東政權”，以調整邦交關係^④。但日本國內軍部主導、外務省追隨的體制未變，中國與英美在華利益矛盾、蘇聯對日軍事干預等傳聞四起。於是，時論對關係改善前景多持審慎態度，認為這種做法極其脆弱不可靠^⑤。

右翼言論界雖對近衛內閣成立（6月4日）同樣抱有期待，但其對於打破僵局的主張截然相反——建議通過“防共擴軍”強化國防、增強“中國駐屯軍”；在抗日運動平息前中止邦交談判；死守華北權益以遏制蘇聯“赤化”滲透。^⑥

四、戰爭爆發（1937年8—12期）

（一）戰爭初期的狂熱報導

這一時期大眾雜誌的涉華報導幾乎全數圍繞廣義的全面侵華戰爭展開。四大刊物刊登的958篇文章中，相關論述達422篇，占比44%，數量龐大，足見媒體狂熱與讀者追捧之盛。儘管日本軍政系統內部存在戰爭擴大派與不擴大派之爭，但大眾雜誌的主要論調明顯傾向於擴大派。這種態勢的形成與戰時對媒體的言論管控加強密切相關：8月13日，當局頒佈了時局相關出版物的管制令，在開戰後立即設立內閣專屬的宣傳機構——內閣情報部以強化宣傳，啟動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體制。^⑦雖有少數文章呼籲言論自由^⑧，但戰爭爆發後，質疑日軍勝利、主張停戰議和的言論逐漸銷聲匿跡。這與媒體為迎合時局、擴大銷路的商業主義不無關係。

最能煽動戰爭狂熱與購買欲望的當屬戰地紀實文學：包括士兵戰記、軍人或記者的戰場報告、作家或記者的隨軍手記等。這類文本達54篇，或誇耀軍功，或渲染前線艱辛，讚美歷經炮火艱辛取得勝利，或嘲諷敵軍的弱小，或揭露敵軍所謂的“暴行”以論證“膺懲”和“擊滅”的正當性。其中通州事件尤具衝擊力，有關日本人被殺現場的紀實文學與控訴文章頻現。^⑨

戰爭爆發後，國民戰爭熱情被煽動，擴大派勢力增強，日本陷入全面戰爭泥潭，報紙、廣播、新聞電影（在影院放映的新聞電影片）、圖書出版等大眾媒體對此難辭其咎，大眾雜誌中的戰記相關文章更是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對其進行內容分析作為後續重要研究方向也具重要意義。未來研究除本文涉及的10種刊物外，還有必要納入King（講談社）、《日出》（新潮社）等

① 尾崎秀實：「滿洲產業の新段階」，《改造》，1937年第5期，第53—64頁。

② 有吉明：「日支國交に就て」，《改造》，1937年第4期，第237—241頁。

③ 須磨彌吉郎：「わが支那觀」，《日本評論》，1937年第4期，第208—215頁。

④ 陳博生：「王寵惠氏と日華兩國の前途」，《日本評論》，1937年第4期，第316—320頁。

⑤ 原勝：「日支新國交調整の跛行性」，《日本評論》，1937年第4期，第321—327頁。

⑥ 三枝茂智：「（近衛內閣與外交）大陸政策を確立せよ」、佐藤安之助：「近衛內閣與對支問題の新展開」、山道襄一：「對蘇、對支外交國策の基點」，《日本及日本人》，1937年第7期，第39—56頁。

⑦ 山本武利：『朝日新聞の中國侵略』，東京：文藝春秋，2011年，第46頁。

⑧ 伊藤正德：「大事變と言論自由」，《改造》，1937年第8期，第116—121頁。

⑨ 山川均：「支那軍の鬼畜性」，《改造》，1937年第9期，第64頁、安藤利男：「死の通州脱出記」，《日本評論》，1937年第9期，第256—265頁、高木翔之助：「天津・通州の記」，《日本評論》，1937年第9期，第273—277頁等。山川的文章引發巴金激烈反駁。張競、村田雄二郎編：『日中の120年 文芸・評論作品選 侮中と抗日 1937—1944』，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第49—60頁。事件考據參見李慶輝：〈通州事件中的日本居留民問題〉，《軍事歷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38—48頁；笠原十九司：『通州事件——憎しみの連鎖を絶つ』，東京：高文研，2022年。

通俗讀物以及《朝日畫報》（朝日新聞社）等畫報期刊及面向“少國民”們發行的兒童讀物等多元化的研究素材。

在54篇文章中有5篇來自中國作者的紀實手稿。其中，《日本評論》記錄了西安事變現場抗日情緒高漲的青年群體的心路歷程^①，並以《看這造謠！》為題，刊載了在空襲中逃竄的民眾以及被迫上前線的士兵所寫的手記。這些具有鮮明立場的紀實作品所採用的標題，應當視為在言論管制環境下採取的策略性偽裝^②。

（二）“華北明朗化”論述

從地域來看，戰爭初期的文章主要聚焦北平及華北地區，除事變報導和作戰相關的文本外，涉及華北局勢分析的文章有48篇。隨著華北“局勢惡化”^③，誘發“冀東政權”解體與戰事升級，“北支自治”的話語主論調讓位於“華北明朗化”目標，其實現路徑強調既得權益保障與經濟開發。撰稿人們的關注點集中到了日本資本在華北的擴張^④及以浙江財閥為核心的中國經濟狀況^⑤。當地的實業界、金融界、僑民團體及領事機構代表就當地投資、資源開發、貨幣體系及經濟政策等展開研討^⑥。另外，由商界、內閣、學界、陸軍、政界要員15人參與的“北支問題”座談會，則以華北政權的未來形態、幣制金融改革與流通體系重建、經濟開發策略等為議題^⑦。

上海事變爆發後，關注點轉向上海戰事及上海局勢，輿論焦點轉向上海戰場，32篇相關報導多描繪這座國際都市在戰爭下變化的圖景。涉及“滿洲”（包括“滿蒙”“滿鮮”“滿蘇”）的論述仍具規模，達21篇，涵蓋朝鮮邊境的危機、蘇聯邊境地區局勢、“蒙古自治政府”及其“赤化”的情況以及日產等財閥資本對偽滿的滲透及滿鐵改組等議題。

日本普遍認為此戰爭具有突發性，是在超出預期的戰果推動下被動進入了戰時體制。^⑧戰爭的非計劃性特徵體現於：所謂“聖戰”“義戰”的正當性論述及意識形態管控類的文章在7—8月刊發的期刊中尚未提及，直至9月（9月刊發10期雜誌）才零星出現，且10—11期的總量之和僅為10篇左右。

（三）擴大派的“膺懲”論

戰爭初期，近衛首相為早日解決爭端，試圖將辛亥革命元老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介派往南京，建立與蔣介石的“和平”對話管道。但7月24日宮崎龍介在神戶港遭憲兵逮捕，計畫流產。^⑨被推測為當時宮崎隨身攜帶在身上的致蔣介石書簡中強調：“白色帝國主義”壓迫東亞諸國淪為“次殖民地”，中國應“為東亞復興及建立真正民族平等之和平，與日本攜手”，擺脫“大英資本主義侵略”，停止抗日。^⑩

“和平”努力失敗後，隨著戰火蔓延至上海，日本政府於8月15日發表“膺懲”聲明，近衛首相發表《國民應對時局之覺悟》一文。文章宣稱“因中國政府無視我方不擴大方針，北支事變

① 蘇醒：「花はいかにして開いたか？」，《『日本評論』》，1937年第8期，第352—365頁。

② 周行：「空襲觀戰記」、黃樂民：「銃後の支那風景」、雪帆：「前線支那兵の手記」，《『日本評論』》，1937年11期，第246—259頁。

③ 鈴木茂三郎：「北支の陰惡化」，《『改造』》，1937年第8期，第102—105頁。

④ 大上末廣：「北支那の經濟的地位」，《『改造』》，1937年第9期，第70—78頁。

⑤ 堀江邑一：「北支事變の經濟的背景」，《『中央公論』》，1937年第9期，第37—50頁。

⑥ 阿部勇等：「座談會 北支經濟を今後どうするか」，《『中央公論』》，1937年第11期，第430—444頁。

⑦ 中野金次郎等：「『北支問題』大座談會」，《『中央公論』》，1937年12期臨時增刊，第120—143頁。

⑧ 前引秦郁彥書，第186—188頁。

⑨ 通過宮崎龍介進行的和平斡旋始末參見前引秦郁彥書，第225頁。

⑩ 宮崎龍介：「蔣介石に與ふるの書」，《『中央公論』》，1937年第10期，第326—336頁。

終釀成‘支那事變’，才導致我方須對支那排日分子施以全面且積極的膺懲”^①。隨後9月2日，對華同志會於芝公園召開“膺懲暴支國民大會”，與會者達3萬人，發表了“膺懲暴支乃天命”的宣言與決議。^②

早稻田大學學者浮田和民曾於日俄戰爭後的大正民主時期對內外分別宣導過立憲主義和“倫理帝國主義”，此時他辯稱日本開戰動機係為守衛“本非中國領土”的獨立“滿蒙”而進行的自衛^③。

曾在清末北京從事當地員警教育並參與策劃“滿蒙獨立”的川島浪速主張徹底擊潰南京政府，稱“奉戴日本皇道精神的神意之大慈悲精神，乃從全世界的侵略苦痛中拯救人類以建和平世界”^④。陸軍大將田中國重疾呼“打倒暴戾蔣政權”^⑤，負責宣傳工作的陸軍新聞班大久保弘一亦鼓吹強化“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⑥。

近衛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對開戰表示認可並稱“戰爭是以和平為目的的一種外交形態，我們是為了消滅戰爭而戰”，在“我們對於支那並無絲毫侵略其領土的野心，也並不想將其作為殖民地”的前提下呼籲“中日合作”。^⑦

（四）自由左翼陣營的戰爭支持

針對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反戰和平論調，自由主義者河合榮治郎反駁稱，“九一八”事變“實屬無奈”，指出中國“侵害滿洲國自由獨立”“推行抗日侮日教育”以表明對日敵意、通過抵制日貨運動將日本與列強差別對待等行徑是發起事變的正當理由。^⑧

東京帝大教授蠟山政道從學者角度以區別於傳統保守派和新興左翼的新視角提出新戰爭邏輯——應對華北新局勢的政治指導原則應超越三民主義或“一民族一國家”，構建“統合性高階文化概念”以調和“日本帝國主義訴求、面向本地居民的民生主義措施與日本國民大眾的利益”。^⑨杉森孝次郎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已“不合時宜”，需要的是“國際大地域主義”，為此認可日本國家資本主義對華北“經濟現代化”的作用。^⑩此類理論試圖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西方構建的普世主義的反抗，構建介於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間的新國際秩序觀——“地域主義”，實為近衛內閣日後提出的“東亞新秩序”論之先聲。^⑪

綜合這一時期的大眾雜誌論調，日本對戰爭正當性的論述可歸納為：作為“資源匱乏”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為自存自衛死守在“滿蒙”的既得利益，以超越國家主義的東亞安定為目標，聯合亞洲被壓迫民族抵抗西方帝國主義，構建中日民族與國家間的合作關係，擊潰蘇聯領土野心，遏制共產國際“赤化”滲透，通過“膺懲”中國抗日運動實現“和平”。

室伏高信宣稱“中國免遭歐洲帝國主義吞併完全得益於其東方有日本的存在”，日本為行使自存自衛和發展權利，“為了給這方土地帶來和平，我們必須先拔出利刃”，是為歷史的考

① 近衛文麿：「時局に處する國民の覺悟」，『日本及日本人』，1937年第10期，第2—4頁。

② （無署名）：「暴支膺懲は天命なり」，『日本及日本人』，1937年第10期，第54頁。

③ 浮田和民：「支那事變の動機及び終極目的を全世界に宣言せよ」，『文明協會ニュース』，1937年第10期，第1—9頁。

④ 川島浪速：「日本魂と支那魂」，『中央公論』1937年第11期，第188—196頁。

⑤ 田中國重：「再び南京政府の打倒に就て」，『明倫』，1937年第9期，第6—15頁。

⑥ 大久保弘一：「支那事變の思想的背景」，『日本評論』，1937年第11期，第328—331頁。

⑦ 風見章：「日支提携への道」，『中央公論』，1937年第11期，第27—32頁。

⑧ 河合榮治郎：「日支問題論」，『中央公論』，1937年第11期，第114—131頁。

⑨ 蠟山政道：「北支政治工作の文化的基礎」，『日本評論』，1937年第11期，第50—57頁。

⑩ 杉森孝次郎：「新支那の思想的建設」，『東大陸』，1937年第11期，第27—33頁。

⑪ 參見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第85—109頁。

驗。^①轉向大政翼贊會的前日共黨員赤松克麿主張“敦促支那進行反思，基於促使他們覺醒的立場”以強硬手段“對其進行反擊”^②。值得注意的是，開戰前曾對中國統一的民族意識表示認同並理解民族主義抗日的諸多知識分子，也轉向了積極支持戰爭。

（五）國際社會的反應

這一階段雜誌報導的主要關注可分為兩大類——國際社會的反應及以中共動向為主的中方抗戰能力。相關文章分別達17篇與29篇（含7篇涉中共專題）。

關於國際社會的反應，日本方面主要存在三方面憂慮：1922年簽署的《九國公約》所確立的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等原則是否會被列強援引；華北地區列強權益的錯綜交織是否會導致列強介入南京政府事務及武器傾銷；蘇聯的暗中活動是否會加劇。^③對此，國際法學者石田榮雄指出，即使國際聯盟提出和平勸告也不具法律效力，《九國公約》已失去實效性故不適用於日本行使自衛權的戰爭，1928年締結的《非戰公約》亦未禁止基於自衛權的戰爭行為。^④另一國際法學者田岡良一則反向指控中國存在違反戰時國際法的行為，包括無差別轟炸導致第三國非戰鬥人員傷亡、中國軍機誤炸美國商船，以及封鎖中國海岸阻礙第三國商船通航等。^⑤列強在華既得利益問題亦引發高度關注，相關論述甚多。^⑥

國際反應中最令日本擔憂的噩夢場景是：戰事擴大化與長期化不僅導致全面侵華戰爭無法局部解決，更可能使日本陷入國際孤立，最終使雙邊戰爭升級為世界大戰。細川嘉六認為中日衝突實質是歐美列強與日本的對抗，若蘇聯加入歐美列強的對日聯合戰線，將蘊含引發歐洲“赤化”的威脅。^⑦

《日本評論》通過轉載美國眾議員警示中日終將走向悲劇性結局的文章，間接表達了對時局的批判立場。該文指出日本對華蔑視態度未改、中國抗日情緒高漲、英蘇對日攻勢日強等現實。^⑧

（六）中國抗戰能力評估

關於中國的抗戰能力，日方主要關注長期作戰可能引發的國際化與“赤化”風險。在此背景下，《日本評論》11月號特別策劃5個專題報導——“支那將走向何方”“戰事將持續多久”“如何處理北支”“中國方面的宣傳”及“上海實地報告”。宇治田直義表示“（在中國的土地上）日本和英、美、蘇聯三國浴血奮戰”，並詳細披露了美、英、蘇三國通過武器援助深度介入中國戰局，指出中國正採取持久戰策略以誘發國際干預。^⑨宋慶齡在論述抗戰邏輯時強調綏遠事件的勝利極大地提振民族意識，表示在國共合作框架下“以歐美尤其是美國及蘇聯的機械文明與當代中國進行融合，必將使民族前途迎來光明未來”^⑩。

同樣地，《改造》11期專題以《中國會赤化嗎》為題，探討蔣介石容共政策的限度、國共合

① 室伏高信：「われわれの立場」，《日本評論》，1937年第8期，第58—66頁。

② 赤松克麿：「支那脅威すべし」，《日本評論》，1937年第8期，第78—79頁。

③ 馬場清保：「北支事變と國際關係」，《カレント・ヒストリー》，1937年第8期，第20—26頁。

④ 石田榮雄：「國際法に映る支那事變」，《カレント・ヒストリー》，1937年第10期，第24—29頁。

⑤ 田岡良一：「支那事變と戰時國際法」，《改造》，1937年第10期，第28—37頁。

⑥ 原勝：「支那事變と戰時國際法」，《中央公論》，1937年第8期，第60—69頁；花田清輝：「日支事變と列國の歸趨」，《東大陸》，1937年第10期，第46—53頁等。

⑦ 細川嘉六：「日支事變と歐米列強の動向」，《中央公論》，1937年第10期，第4—25頁。

⑧ 薩繆爾·佩法：「抗争する運命にある日支兩國」，《日本評論》，1937年第11期，第338—343頁。

⑨ 宇治田直義：「支那長期抗日作戰の裏」，《日本評論》，1937年第11期，第111—120頁。

⑩ 宋慶齡：「支那は何をなすべきか」，《日本評論》1937年第11期，第318—325頁。

作前景、“赤化”擴張範圍是否將觸達外蒙古與新疆等問題。^①

其他關於中國局勢的專題還包括：中國軍力與抗戰能力評估^②、抗日陣營構成與思想潮流^③、中國共產黨權力動向及其對南京政府的影響力和與共產國際及歐洲的關係等幾大類別^④。

五、戰爭擴大化與長期化（1938年1—7期）

（一）南京陷落後的樂觀論調

這一時期大眾雜誌的涉華報導主要聚焦於開戰後的戰術走向，視角從南京陷落擴展至華中地區，同時關注佔領後的華北治安與經營狀況、偽滿及蒙古局勢等涉及全國範圍的廣泛議題。相關文章總數達288篇，其中關於從入城到南京陷落及後續局勢的報導18篇，華北經營情況分析28篇，“滿蒙”局勢探討14篇。

南京佔領初期，雜誌多刊登渲染日軍在包圍戰中“驍勇善戰”的戰記文學，但無一篇文章提及對南京市民的暴行。此現象源於事變後隨著時局緊張，言論管制日趨嚴厲，學術界與文藝界陷入動盪。受《日德防共協定》（1936年11月）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1937年8月）影響，報刊和雜誌全面轉向戰爭報導，流行作家紛紛撰寫從軍記。兩次人民戰線派的大逮捕更導致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術研究、教學活動及社會寫作極大受限，西方電影與書籍進口被禁。^⑤

相反，勝利氛圍催生否定南京政府、扶植親日政權、鎮壓抗日、“解放中國乃至亞洲”的樂觀預期。^⑥作為盧溝橋事變後擴大派的核心人物，上海事變時任實戰部隊聯隊長的和知鷹二宣稱，盧溝橋事變乃“天意”，主張尋找反蔣反共親日派領袖以實現中日合作。^⑦《京城日報》主筆中保與作斷言南京陷落標誌著中華民國的瓦解，並極為樂觀地預言以華北防共新政府為起點，將通過聯省“自治”形成中央政權。^⑧

更有論者發散性地將南京陷落渲染為繼承古代朝鮮半島擴張“神話傳統”的壯舉，將其視為實現“東亞解放”和“明朗亞洲”的好機會，吹噓“獲得了制霸東亞的經驗”。^⑨甚至主張擺脫國際聯盟和國際條約的束縛和對列強的“屈從外交”，以武力實現“解除東亞大陸的武裝”。^⑩甲午戰爭與辛亥革命後形成的對華蔑視與國民性批判話語再度顯現^⑪，甚至公然宣稱“日本人應秉持種族優越感，自視為高中國人一等”，主張對華採取“永久駐留方針”。^⑫

① 特輯陣容包括：吉岡文六：「上蔣介石は赤化せず」、杉山平助：「激化し行く國內對立」、平山弘：「中國共產黨と蔣介石」、大西齋：「國共合作その後」、布利秋：「赤外蒙と赤新疆」，《改造》1937年第11期，第240—270頁。

② 吉岡文六：「蔣介石は戰へるか」，《中央公論》，1937年第9期，第174—181頁；（無署名）：「抗日支那軍 正體の解剖」，《大義》，1937年第9期，第16—20頁；及川六三四：「支那の對日長期抗戰は可能か」，《中央公論》，1937年第10期，第74—91頁；周中規：「民衆動員の實施法案」，《日本評論》，1937年第12期，第78—86頁等。

③ 楊樹浦：「中國救國戰綫の七人幹部公判記」，《改造》，1937年第8期，第164—171頁；小田嶽夫：「抗日支那の作家・知識階級人」，《文藝春秋》，1937年第8期，第62—70頁；《日本評論》1937年第9期，第194—223頁小特輯「支那人の見た日本」轉載了在『宇宙風』『生活週刊』發表的日本人論；實藤惠秀：「抗日思想戰綫の強化」，《東大陸》，1937年第10期，第108—115頁；波多野乾一：「郭沫若・ヌーラン・陳獨秀」，《中央公論》，1937年第10期，第402—409頁；濱田峰太郎：「支那民衆組織と國共對立」，《中央公論》，1937年第12期，第142—150頁；平山弘：「支那の文化人は今何をしているか」，《改造》，1937年第12期，第45—47頁等。

④ 下條雄三：「『ソヴェート支那』への動き」，《改造》，1937年第10期，第59—70頁；德富雪夫：「日支事變の擴大と共產黨の活躍」，《東大陸》，1937年第10期，第40—45頁；大塚令三：「『支那から手を引け』」，《中央公論》，1937年第11期，第87—96頁等。

⑤ 本多顯彰：「知識階級の動搖」，《文藝春秋》，1938年第6期，第196—200頁。

⑥ 中山優：「南京陷落の後に來るもの」，《東大陸》，1938年第1期，第110—113頁。

⑦ 和知鷹二：「支那事變後の新方向」，《中央公論》，1938年第1期，第197—201頁。

⑧ 中保與作：「南京陷落と支那の明日」，《文藝春秋》，1938年第1期，第148—154頁。

⑨ 西田卯八：「南京政府と没落と東洋概觀」，《日本及日本人》，1938年第1期，第14—18頁。

⑩ 三枝茂吉：「忍從外交を出て雄邦日本の完成へ」，《日本及日本人》，1938年第1期，第19—25頁。

⑪ 馬場公彦：「同時代日本人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1期，第252—253頁。

⑫ 野口榮二：「對支工作と吾が國民の心得」，《カレント・ヒストリー》，1938年第1期，第18—23頁。

在哈佛大學進修法學後，曾參與明治憲法起草的前國務大臣金子堅太郎更是鼓吹日本應以東亞盟主自居，“向全世界宣佈亞洲門羅主義”，“徹底膺懲暴戾的支那軍隊，根除擾亂東亞和平的禍源”。^①

作為對戰爭初期提出的“日本自存自衛與東亞和平穩定”原則的修正或覆蓋，新的統治意識形態陸續登場——陸軍將領建川美次主張超越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確立以“同胞主義”為基礎的日本主義^②。早稻田大學教授杉森孝次郎提出“大陸經營思想原則”，呼籲日本從“國際大地區主義”立場打破白人優越論，“超近代國家進化”，從而發揮領導東亞解放的作用。^③這種論調實為後來“世界史哲學”與“近代超克論”的新型日本主義論的先聲。供職於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國家主義者藤澤親雄借儒家經典《大學》提出“新民主義”，主張建設“大亞洲民族共同體”。^④

基於上述願景，南京陷落次日，日方在華北成立了親日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但觀其領導層構成，非但未能建立中央政權，反而倒退至軍閥割據時代。該政府雖冠以全國名號，實際統治僅限河北地區，僅能寄望於整合山西、山東等地的親日政權。^⑤1938年3月28日，進入華中地區後，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但華北與華中之間的陸路交通斷絕，想要打通政權，需待日軍完成南北貫通作戰。^⑥

（二）中國的全面抗戰

與南京陷落後言論界瀰漫的速勝樂觀論調相反，蔣介石呼籲展開“全民徹底抗戰”（12月15日）。《文藝春秋》轉載胡適面向民眾的演說，強調中國在人力、財力、軍備層面均具備持久抗戰的能力。^⑦

《改造》社長山本實彥在戰爭爆發，尤其是南京陷落後，一改此前對中國民族意識的理解與同情立場，轉而明確支持戰爭勝利與反蔣路線。他指責蔣的長期抵抗只會徒增民眾的犧牲，要求其儘快下野^⑧，並在徐州陷落後繼續施壓，執拗地催促其下臺^⑨。

關於戰局走向，輿論對敵軍持續抗戰或潰敗的預測出現分歧，爭議的焦點集中於戰術評估與國共合作的持續性。

同盟通信記者山上正義認為，當前戰局下除廣東外武器補給線已遭切斷，“國民政府將在政權崩潰前夕對日屈服”^⑩。日本電報通信社記者橫田實推測，徐州一旦陷落，中國將陷入崩潰狀態，屆時或被迫接受和談。^⑪《時事新報》波多野乾一雖否定了日方所預測的蔣會第一時間發動反共政變的可能性，但認為如果日軍快速推進，促使英國放棄援華，或能導致國共分裂。^⑫《讀賣新聞》的岩村三千夫指出，蔣介石通過壓制反蔣勢力、將共軍改編為八路軍納入國民革命軍體

① 金子堅太郎：「東洋平和と亜細亞モンロー主義」，《中央公論》，1938年第1期，第117—122頁。

② 建川美次：「同胞主義の旗の下に」，《日本評論》，1938年第1期，第154—159頁。

③ 杉森孝次郎：「大陸經營の思想的根據」，《改造》，1938年第3期，第24—32頁。

④ 藤澤親雄：「新民主義と日支關係の更新」，《中央公論》，1938年第4期，第141—152頁。

⑤ 芳澤謙吉：「北支新政權の誕生」，《改造》，1938年第1期，第314—319頁。

⑥ 橫田實：「支那の新秩序と其基準」，《中央公論》，1938年第5期，第120—127頁。

⑦ 胡適：「支那抗戰の意義と將來」，《文藝春秋》，1938年第1期，第436—442頁。

⑧ 山本實彥：「蔣介石は何を考へてをるか」，《改造》，1938年第3期，第50—68頁。

⑨ 山本實彥：「蔣介石下野せよ」，《改造》，1938年第7期，第80—87頁。

⑩ 山上正義：「蔣介石は屈服するか」，《中央公論》，1938年第2期，第89—97頁。

⑪ 橫田實：「長期抗戰への新態勢」，《中央公論》，1938年第2期，第99—107頁。

⑫ 波多野乾一：「南京陷落と國共合作の前途」，《改造》，1938年第1期，第257—263頁。

系，對共產黨實施懷柔與牽制，從而確立長期抗戰方針。^①《東大陸》主編兼發行人關山茂太郎指出，日方對國共分裂的誤判源於忽視了抗日動機的本質，強調想要培育民族資本實現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經濟擴張之衝突不可避免。^②針對徐州陷落後的持續抗戰，波多野乾一視漢口陷落為破局的關鍵。^③日本革新黨的赤松克麿斷言國共為“水火不容的兩大勢力”，“分裂已成必然趨勢”^④。

（三）進入“事變第二階段”

南京陷落約半年後，對全面侵華戰爭的實際情況已與開戰初期多數人主張的“不擴大方針”“一擊制勝、速戰速決”等預期大相徑庭。中國方面展現出持久抗戰的決心，堅持遊擊戰、消耗戰與持久戰策略。日本言論界將盧溝橋事變至南京陷落劃為“事變第一階段”，而將南京陷落後視為“事變第二階段”，開始形成持久戰認知。明確提出此劃分框架的是松本重治與尾崎秀實。

松本重治強調蔣介石憑藉穩固權力基礎堅持不投降與長期抗戰，主張第二階段應重點監視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動向，警惕英國通過幣制改革、銀行改革與宣傳滲透強化介入，並預見蘇聯在北方的施壓將加劇，建議日本著力優化佔領區的治理工作。^⑤原杭州領事米內山庸夫認為，第二階段的抗戰將愈發受共產黨影響而長期化，若蘇聯共產主義滲透加強，日本國力明顯衰退，日蘇開戰風險將顯著提升。^⑥

尾崎秀實指出，“日本正與支那這個難以捉摸的怪物展開盲目纏鬥”，強調“中日事變最深層的本質關乎日本生存問題”。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持續抗戰源於“民族凝聚力”，即便浙江財閥失勢，主力部隊仍得保存，英國支持的幣制改革成功確保財政基礎，維繫著抗戰能力。^⑦一個月後，他再撰文批判日本缺乏建設性的大陸政策，主張通過擊潰敵軍獲得軍事勝利，進而合併“華北臨時政府”與“華中維新政府”，斬斷列強伸向中國的觸角。其結論本質上與鼓吹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右翼論客及陸軍將領無異。^⑧

（四）對國際局勢的擔憂

儘管戰果顯赫，但隨著戰線擴大，各類難題堆積如山，不安因素持續累積。取得徐州會戰勝利的日軍被迫向漢口、廣州、重慶持續推進，同時不得不密切關注列強動向。1937年11月《日德意防共協定》簽署後，日本對英美法組建抗日同盟及日俄戰爭爆發可能性的疑懼與日俱增。

與“九一八”事變時期不同，防共包圍網從日德到日德意的擴展，反而削弱國家安全保障，加劇在國際上的孤立感。相較於沉醉於勝利氛圍的民眾，嚴肅思考大陸問題的知識界人士為局勢的劇變所震懾。《朝日新聞》的大西齋在事變一周年展望中警示：“若拘泥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作繭自縛坐失良機，繼續依賴軍事行動耗盡國力，縱使戰功赫赫，終將化為泡影，其愚行令人戰慄。”^⑨還有學者建議將華中設為緩衝地帶以修復因上海及華中權益受損而惡

① 岩村三千夫：「蔣政權の持續性」，《改造》，1938年第1期，第360—366頁。

② 關山茂太郎：「國・共提携の現状と日本」，《東大陸》，1938年第2期，第123—131頁。

③ 波多野乾一：「蔣政權と共產軍の今後」，《改造》，1938年第7期，第72—79頁。

④ 赤松克麿：「國共分裂の必然性」，《文藝春秋》，1938年第5期，第116—126頁。

⑤ 松本重治：「事變第二期に入る」，《改造》，1938年第2期，第50—61頁。

⑥ 米內山庸夫：「支那事變の第二期」，《中央公論》，1938年第3期，第142—151頁。

⑦ 尾崎秀實：「長期抗戰の行方」，《改造》，1938年第5期，第80—91頁。

⑧ 尾崎秀實：「長期戰下の諸問題」，《中央公論》，1938年第6期，第70—82頁。

⑨ 大西齋：「事變の回顧と展望」，《改造》，1938年第7期，第260—268頁。

化的美英關係^①。

日軍在戰爭中實施戰略空襲，轟炸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漢口等城市。中方雖向國際社會控訴無差別轟炸暴行，但國際法學者清瀨一郎宣稱：“對‘設防城市’可進行無差別炮擊”，主張不必拘泥“軍事目標主義”，公然支持並推崇以無差別空襲“將廣州、漢口化為焦土”。^②在此理論背書下，日軍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竟對重慶實施了超過200次戰略轟炸的暴虐行徑^③。

（五）日本“生命線”由“滿蒙”轉向華北

南京與徐州陷落使日本勢力範圍擴展至華中，國民政府被降格為不具備談判資格的“暴戾地方政權”。於是，西安事變時期的對華再認識論調被視為對抗日政府的諂媚，“冀東政府”解體論隨之煙消雲散，日本轉而著手扶植傀儡中央政權，推動“臨時政府”與“維新政府”合併。至此，日本的“生命線”已從“滿蒙”轉移至華北——後者成為維繫“滿蒙”的命脈。日產財閥代表、偽滿重工業開發總裁鮎川義介標榜偽滿資源產業開發與“日滿經濟圈”的落成，主張將大陸經營定位為“滿洲產品的巨大市場”。^④

關山茂太郎建議華北開發應以日資與民族資本合資的形式推進^⑤；橘英雄則強調“日滿中經濟集團”建設須服務於“日本為主導的日元經濟集團利益”，反對單純為中國發展而振興經濟。^⑥其結果據秦郁彥研究，這一時期的對華投資大部分用於日本產業資本在當地設廠，對民族資本的借款、融資及合資專案極少。^⑦

日本作為華北經濟工作的基礎設立了中國聯合準備銀行（2月11日），通過回收舊紙幣發行“新法幣”（聯銀券），試圖構建“日滿支日元經濟集團”。^⑧1935年11月國民政府接受英國財政部顧問李滋一羅斯（F. W. Leith-Ross）的建議實施幣制改革後，法幣已實現全國流通。日方舉措旨在切斷中國金融界對英美外匯儲備的依賴，但因新幣兌換受阻且民眾爭兌外匯，聯銀開業即不得不暫停外匯交易。^⑨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則公開表露信心稱，幣制改革奠定的財政基礎、國際援助及稅收增長足以支撐長期抗戰。^⑩

六、戰局膠著化（1938年8—12期）

（一）事變一周年

這一時期，大眾雜誌的涉華報導關注點隨著武漢作戰的推進和廣東佔領，進一步擴大到了華南地區。對華北經營的關注也持續高漲，尤其是日本推進的幣制改革引發的擔憂日益加深。同時，圍繞東亞新秩序聲明，出現了以“東亞”“亞細亞”等廣域概念提升指導理念的理論探討。

在此期間的相關報導總數達301篇，其中與武漢戰役相關的多達37篇，廣東戰役（含香港及華南全域）相關21篇。關於張鼓峰事件僅1篇文章推測蘇聯出兵意圖，認為蘇聯通過共產黨將蔣

① 具島兼三郎：「列強の狀勢と我が大陸政策の進路」，《改造》，1938年第7期，第48—61頁。

② 清瀨一郎：「無差別空爆妨げず」，《改造》，1938年第7期，第21—27頁。

③ 潘洵著，徐勇、波多野澄雄監修，柳英武譯：《重慶大爆撃の研究》，岩波書店，2016年。

④ 鮎川義介：「滿洲再認識論」，《中央公論》，1938年第9期，第154—162頁。

⑤ 關山茂太郎：「事變の現狀と北支開發途上の諸問題」，《東大陸》，1938年第3期，第76—84頁。

⑥ 橘英雄：「對支開發と指導原理」，《カレント・ヒストリー》，1938年第5期，第12—16頁。

⑦ 前引秦郁彥書，第316—317頁。

⑧ 高梨信藏：「中國聯銀誕生と日支關係」，《カレント・ヒストリー》，1938年第3期，第90—94頁。

⑨ 小林一三：「天の時を逸するな」，《日本評論》，1938年第5期，第137—143頁。

⑩ 孔祥熙：「中國の財政力と長期抵抗」，《改造》，1938年第3期，第250—253頁；另有孔祥熙：「抗戰期に於ける財政政策」，《改造》，1938年第7期，第168—172頁。

介石捲入中日全面戰爭，以消耗中日兩國實力並擴大自身影響力。^①此外，華北經營相關報導有13篇，後期逐漸擴展至整個大陸經營範疇，考察範圍轉移至華中、華南地區。涉及新法幣貨幣統一問題的報導有7篇，討論東亞新秩序指導原理的報導為11篇。

1938年7月7日，在盧溝橋事變一周年之際，日本發佈敕語稱：“日中合作共榮，有助於世界和平”，國民積極回應，以繳納宣傳金等方式熱烈慶祝周年。^②

蔣介石誓言為三千萬東北人民的“壓迫屈辱”報仇，痛陳“若諸君不能積極殺敵，則性命終難保全，且將蒙受叛祖汙名”（《蔣委員長告東北同胞書》）^③。《日本評論》10期特輯以《敗走支那的現場報導》為題，刊載了被迫經歷嚴酷戰場生活的重慶市民是弗、武漢訪客葉文津等人的戰時手記。郭沫若稱簡樸節約的生活習慣促使了國民的“精神武裝化”。居住在汕頭的周越揭露了街頭充斥對貪官污吏的怨恨，描繪“具有持久毅力，一步一步完成工作”的市民面貌^④。編者意圖通過此類報導向日本讀者展現中國百姓“戰敗而抗戰不息，走向勝利”的頑強抵抗精神。

（二）意識形態的滲透困境

日本軍隊的連戰連勝和主要城市相繼陷落，意味著日軍被誘入內陸並陷入消耗戰的泥潭。日本知識界不得不普遍接受長期戰不可避免的現實。事變一年後，學界和言論界開始提出系統化的大陸經營論，其目標是通過思想宣傳和經濟運作，掌控佔領區民眾的意識形態並實現“歸順”。

就思想戰而言，當前中日之間已展開宣傳對抗，伊佐秀雄強調不應僅停留於言論管控，更需主動引導輿論。^⑤同時，各界名人也帶著文化工作的使命，紛紛前往中國大陸。^⑥此外，近衛聲明提出的“東亞新秩序”路線，使佐久間貞次郎（《回光》發行人）、山田武吉（《滿蒙問題根本大策》作者）、中野正剛（政治結社東方會主持人）、土肥原賢二（陸軍特務機關長）等皇道派日本主義者得以借“大亞洲主義”論述，試圖超越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重提以日本為盟主的亞洲霸權構想。^⑦

《中央公論》1938年8期推出《大陸長期建設課題》（本地特輯），滿鐵調查部梨本祐平雖提出通過中日經濟協議會與國策開發公司實現經濟建設的理想，但承認當前國防工業優先與日本資本短缺的現實，使生產力擴充與本土資本合作前景暗淡。^⑧同期另三篇文章探討了治安對策、農村對策及意識形態控制，旨在鎮壓抗日運動與應對遊擊戰^⑨。

《日本評論》1938年8期的《大陸經營諸問題》特輯中，關於思想戰的討論焦點集中於如何處理在軍事上敵對的國民黨意識形態核心——三民主義。九州帝國大學教授鹿子木員信將其定性為“充滿抗日意識炸藥的對日炸彈”，主張“消滅剷除”。^⑩而前共產黨成員松本慎一認為，缺乏群眾基礎的“臨時政府”與“維新政府”要獲取信任，必須標榜作為民族意識凝聚力核心的三

① 三島康夫：「張鼓峰事件と中國共產黨」，《東大陸》，1938年第9期，第35—43頁。

② （佚名）：「日支事變一週年に際して」，《日本及日本人》，1938年第8期，第11—13頁。

③ 蔣介石：「滿洲人民に泣訴す」，《日本評論》，1938年第11期，第226—229頁。

④ 是佛：「重慶だより」、葉文津：「武漢巡禮」、郭沫若：「戰時下の支那人生活」、周越：「官汚吏を呪ふ」、馬國亮：「動亂の漢口市街」，《日本評論》1938年第10期，第97—115頁。

⑤ 伊佐秀雄：「日支宣傳戰」，《改造》，1938年第8期，第41—46頁。

⑥ 高松棟一郎：「大陸へ渡る文化人」，《改造》，1938年第8期，第203—207頁。

⑦ 山田武吉：「亞細亞主義と新支那」，《日本及日本人》，1938年第8期，第24—27頁。

⑧ 梨本祐平：「大陸政策の基本的問題」，《中央公論》，1938年第8期，第370—380頁。

⑨ 土井章：「北支建設問題と治安工作」、奥村榮：「ゲリラ戰の展開と北支農村對策」、鳴海四郎：「支那民衆を把握せよ」，《中央公論》，1938年第8期，第381—409頁。

⑩ 鹿子木員信：「支那事變の本質と其の徹底的解決」，《日本評論》，1938年第8期，第66—75頁。

民主主義。^①

值得注意的是，為大陸經營統治指導原則的亞洲主義提供理論支撐的，恰是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培養的實為左翼學者。曾參與日本無產階級科學同盟的船山信一提出，須超越以單一民族國家為對象的日本主義與三民主義，構建以日本為主導的“東亞協同體”，實現“日本主義的東方化”。^②蠟山政道認為此次事變具有“東方覺醒的世界史意義”，是中國超越民族主義與日本共建“地域命運共同體”的良機。^③三木清更強調“東亞協同體”應是以“承認獨特性與自主性”為特徵的整體主義體制，是開放的地域主義而非世界主義，其建設“必須意味著新基礎下的共存共榮”。^④“大亞洲主義”“東亞協同體”“東亞思想”等概念獲得從軍人、政客到學者，右翼至左翼的廣泛支持，成為思想戰的最大公約數武器。

（三）第二次再認識論

對日本言論界而言，事變一周年繼西安事變後的中國再認識論之後，成為再一次認識中國的試金石。第一次再認識的對象是中國，而此次轉向日本自身。《朝日新聞》上海支局長太田宇之助指出：第一階段誤判形勢的舊“中國通”（以軍方及大陸浪人為主）已退出舞臺，第二階段由外交官僚與駐華記者構成的新“中國通”開始採用馬克思主義作為新的分析工具。這一階段的新課題在於克服民族主義並制定能促使中國民眾合作的有效政策^⑤。太田的論調實則僅停留於對敕語的復述，強調“貫徹皇道精神，以兄弟之誼平等對待支那，尊重其意志實現名實共存的共榮”^⑥。

本質上，經馬克思主義洗禮的“東亞協同體”理論，與關東軍少將土肥原賢二（從事服務於中國侵略的特務機關工作）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推行的“聖戰”，在內在邏輯上具有同構性。^⑦還有論者冷峻指出：無論日本如何呼籲中國民眾進行對等協商，對“這個狡猾的民族”亦無效用，唯有凌駕於他們之上才能避免被輕視。^⑧中國方面積極呼應此輪亞洲主義合作倡議的，在所涉獵的文獻範圍內，僅有“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實業部長王子惠等極少數人物。^⑨

一年半前，西安事變迫使日本重構中國認知，推動其突破傳統中國觀，使採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工具的新“中國通”取代舊派成為主流。然而面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抵抗浪潮，認為“中國本質未變、不具備近代國家資格”的舊“中國通”話語正強勢回潮。

（四）圍繞法幣的貨幣戰

經濟工作的實質，是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與日本1938年3月在北京設立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新法幣”（聯銀券）之間的貨幣戰。藤岡啟宣稱“日元集團對法幣的殲滅戰”已見成效，舊法幣被迫退出市場，聯銀券流通進展順利。^⑩但聯銀成立數月後，法幣雖持續貶值，但在包括華北佔領區在內的地區，法幣仍是主要流通貨幣。華北地區因日本投放的資金無法回收，導致物價飛漲，聯銀券流通量不足法幣的五分之一。^⑪為此，日軍在華中佔領區試圖發行軍票以回

① 松本慎一：「支那民族大眾爭取の問題」，《日本評論》，1938年第8期，第76—83頁。

② 船山信一：「東亞思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央公論》，1938年第9期，第4—18頁。

③ 蠟山政道：「東亞共同體の理論」，《改造》，1938年第11期，第6—27頁。

④ 三木清：「東亞思想の根據」，《改造》，1938年第12期，第8—20頁。

⑤ 太田宇之助：「新支那認識への道」，《中央公論》，1938年第11期，第125—137頁。

⑥ 太田宇之助：「支那をどうする」，《日本評論》，1938年第11期，第135—141頁。

⑦ 土肥原賢二：「對支國民綱領の根幹」，《中央公論》，1938年第11期，第116—123頁。

⑧ 杉山平助：「支那思想對策論」，《改造》，1938年第10期，第55—68頁。

⑨ 王子惠：「亞細亞的理想」，《改造》，1938年第11期，第142—149頁。

⑩ 藤岡啟：「敗戰支那の通貨抗戰」，《中央公論》，1938年第9期，第82—91頁。

⑪ 渡邊鎮雄：「法幣に関する一考察」，《明倫》，1938年第11期，第25—28頁。

收日元紙幣。《上海每日新聞》主筆園田日吉認為：“法幣未崩潰而保持一定價值，構成中國抗戰力量的重要支柱。”^①

知名經濟記者木村禧八郎批判日本貨幣學者對舊法幣的樂觀論調充滿謬誤：日本拒絕參與李茲一羅斯（F. W. Leith-Ross）主導的幣制改革是錯誤的開端，聯銀券流通策略亦告失敗，通過拋售日元收購法幣反而加劇日本外匯短缺，卻充實了國民政府系銀行的外匯儲備。^②日本經濟學家林周盛分析，在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中國，法幣在英國金融資本支持下與英鎊集團掛鉤，又作為美國產業資本的消費市場維持對外價值穩定。他強調當下是統制性集團經濟時代，應“建立以日本為領導核心、涵蓋偽滿、華北、華中及蒙疆的東亞日元集團制度”，由日本銀行主導國際收支並推進舊法幣回收工作。其思想根源在於認定全面侵華戰爭“實為遠東地區的日英經濟戰，是爭奪中國大陸控制權的日英爭霸戰”。^③

（五）總體戰體制下的全面侵華戰爭

隨著南京、徐州、廣州、武漢等主要城市相繼陷落，戰局陷入膠著，思想戰與經濟戰亦無顯著進展，戰爭的結束變得不可預期。戰爭長期化迫使日本開始正視開戰初期未曾預見的戰爭本質。政治評論家馬場恒吾察覺到戰爭性質的變化，即一個嚴峻的事實——以科技進步為背景的近代戰爭本質顯露無遺，通過無差別空襲實施焦土殲滅戰成為必然，戰爭終結已非戰場決勝所能達成。^④陸軍軍務局佐藤賢了指出，事變前後國內體制發生轉變：適應一戰後集團經濟化的計劃經濟對綜合國力的提升、“親日滿防共”所推進的“大東亞聯盟建設”、國家總動員體制下所“完善的‘大陸國防國家’”等，都標誌著從局部戰爭向總體戰的一種不可逆的“變革”。^⑤

至此，對全面侵華戰爭的關注點轉向：冷靜評估敵方抗戰能力與本國應戰能力；基於綜合國力對比選擇戰略戰術；第三國及國際社會和國際機構的介入。日本大學教授小林幾次郎通過剖析國民政府的中央財政指標，指出其脆弱的財政基礎主要依賴英國與民族資本支撐的法幣制度在關鍵時刻突破難關。^⑥昭和研究会成員堀江邑一研判：歐洲列強間的對立因經濟危機加劇而激化，中國市場的戰略重要性凸顯。隨著廣東和漢口陷落，中國主要貿易港口被日本佔領，英法或將為協助蔣政權建設西南補給線而結盟，英美有可能形成對日共同戰線以維護在華權益。^⑦另有第三國的中國觀察家斷言，日本雖對國際社會聲稱征服中國對列強有利，但實際上“歐美諸國從日本征服中國中無利可圖，反將蒙受重大損失”^⑧。

歷經一年半的中日消耗戰，日本逐漸清晰地意識到，在作為其交戰對象的中國背後，已隱然可見日後太平洋戰爭中將成為其新對手的英、法、美、蘇等國的巨大身影。

結語——浮現的疑問及其推論

本研究聚焦中日全面戰爭初期，通過分析日本主流雜誌刊載文章，揭示當時日本人對戰爭的認知。研究選取1936年初至1938年末在東京發行的4大綜合雜誌及6種專業性較高的刊物，篩選出

① 園田日吉：「法幣はなぜ崩壊せぬか」，《改造》，1938年第12期，第30—38頁。

② 木村禧八郎：「法幣問題の現在・將來」，《東大陸》，1938年第12期，第24—30頁。

③ 林周盛：「中支占據地域の通貨制度論」，《日本評論》，1938年第12期，第266—278頁。

④ 馬場恒吾：「事變處理の重點」，《中央公論》，1938年第10期，第70—76頁。

⑤ 佐藤賢了：「支那事變と革新」，《改造》，1938年第11期，第130—137頁。

⑥ 小林幾次郎：「蔣政權今後の抗戦力」，《改造》，1938年第12期，第21—28頁；石浜知行：「武漢淪陷直前の支那經濟」，《改造》，1938年第10期，第6—25頁。

⑦ 堀江邑一：「東亞新事態と列強の動向」，《中央公論》，1938年第12期，第79—88頁。

⑧ 裴斐：「日本は支那の門戸を閉鎖する」，《文明協會ニュース》，1938年12期，第32—48頁。

736名撰稿人撰寫的1351篇文章。通過文本分析，揭示全面侵華戰爭從局部衝突演變為全面戰爭並長期化的過程中，戰爭性質向總體戰轉變的關鍵節點。

整體而言，撰稿者對中國局勢的研判雖存在立場差異，但普遍展現出對局勢和發展的精準把握，並致力於事實報導與評論。雜誌的發行方也通過刊載中國知識界觀點及第三方西方觀察家論述，盡可能地維持報導的客觀性。由此可知，對於當時步入中青年且具備高等教育背景的日本知識階層而言，若以無法獲取準確信息、未能認知戰爭真相為由推卸戰爭責任，似乎難以成立。

通過研究，以下三點核心疑問浮出水面：

第一，此戰爭是否不可避免？若非如此，轉捩點何在？

從雜誌報導的變化來看，1936年末的西安事變或許是關鍵轉折。若日本基於中國再認識論，採取靜觀或主動合作策略而非固守防共，戰爭或可避免。然而，關東軍與中國駐屯軍堅決以軍事威懾驅逐抗日勢力，其背後有守護偽滿權益、確保“華北分離工作”成果的廣泛民意支持和對開戰的默許，致使重構中日關係的可能性被扼殺。

第二，盧溝橋事變後，政府與軍部達成的“局部解決、不擴大”共識為何失效？

該共識僅為事變初期的短暫協定，陸海軍之間在“蘇聯主敵論”“北進南進論”等戰略方面存在意見對立，陸軍內部對事件是否擴大化也存在分歧。^①同時，擴大派的論調憑藉在地軍隊的積極交戰論與中國全面抗戰宣言而佔據優勢。加之政府發佈“膺懲暴支”的強硬聲明，並在舉國一致的內閣體制下公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宣言，反而堅定了中國即使“焦土抗戰”也要頑強抵抗的意志。媒體大肆渲染南京等城市陷落的戰果，煽動了民眾對戰爭的狂熱，開始壓倒性地支持戰爭並形成輿論壓力，使決策層喪失政策彈性，最後導致突如其來的開展伴隨意想不到的戰果，演變成野馬脫韁般的失控局面。

關於盧溝橋事變後戰事擴大為全面戰爭的原因，毋庸贅述。然而，必須著重強調的是，日本由此過渡至動員全體國民的總力戰體制，是區別於以往對外戰爭形態的、前所未有的局面。本文指出其成因包括：超出預期的巨大戰果、全面媒體言論管制所激發的戰爭意志、以及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實施。儘管如此，基於當時出版的大眾雜誌中職業從軍作家、士兵及後方民眾的戰記文獻，對基層民眾中國觀形成機制進行的系統性的定量與定性分析，將需在未來研究進一步深入展開。

第三，盧溝橋事變的局部衝突何以演變為全面長期戰爭？

從軍事衝突向全面戰爭的無序擴大，本文特別聚焦於盧溝橋事變後漸次興起的若干“聖戰論”文本中所見的戰爭正當化邏輯。研究揭示：左派學者及中國問題研究者主導性地順應當時世界經濟集團化趨勢，提出“大地區主義”構想，以此“合理化”開戰正當性，並設計出近衛戰時體制下的“東亞新秩序論”，最終匯入日本軍部提出的打倒國民政府之思潮。

此外，關於南京佔領後右翼論者基於中國蔑視觀所提出的聖戰完結論，其思想淵源未及在本研究中詳加論述。因此，作為一種推斷，本研究認為這或許與西安事變同年發生的“二·二六”事變餘波存在關聯。1936年2月26日，以“清君側”旗號起事的陸軍一批將校雖通過自決、歸順、被捕等方式遭肅清，但其標榜的皇道精神並未消弭。這種精神異化為一種怨念甚至是妄圖稱霸大陸的幻想，在軍部干政、統帥權膨脹的軍國主義化進程中，被關東軍及部分陸軍將校所繼承。這種思想演變混合了神話時代流傳的“大陸雄飛”傳說、試圖將征服大陸幻想付諸實施的

① 前引秦郁彥書，第145頁。

暴行、近代以來由於打破白人帝國殖民統制而實現的民族自卑感的消弭、甲午戰爭後滋生的對華蔑視觀等長年累月的深層民族心理。這些歷史情結最終固化為“膺懲”論，繼而派生出“聖戰”“義戰”等巧立名目的戰爭正當化論述，並演化為所謂為“維護東洋和平”而不得已開戰的戰爭論及基於“東亞新秩序”的大陸經營論。這種後設的侵華戰爭合理化邏輯，最終發酵為“大東亞共榮圈”論及“大東亞戰爭肯定論”。^①

關於戰後日本戰爭肯定論復蘇的演進脈絡，擬留作後續研究課題。此外，該現象與199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以批判所謂“自虐史觀”及“東京審判史觀”為表現形式的侵略戰爭否定論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其如何演變為當今右翼的修正主義歷史觀，同樣屬於今後亟待釐清的課題。

通過本研究，關於中日全面戰爭的兩項既往定論，亦獲得當時日本輿論狀況的印證。

首先，反戰聲音的缺位。在甲午、日俄戰爭時期尚存的反戰言論已完全絕跡。同時，“九一八”事變時期尚存的殖民地放棄論已不復存在，“滿蒙”是日本的既得利益，且構成日本在中國的生命線這一觀點成為言論的普遍大前提，對“滿洲國”的批判言論在本研究涉及的文章中亦徹底消失。這表明全面侵華戰爭後，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抵抗戰爭的能力顯著弱化。即便是曾對中國抗日運動及民族意識表示理解與同情的馬克思主義者，其言論活動亦未能例外。

其次，從侵略、加害者視角出發的言論蕩然無存。對於交戰過程中中國及中國人民所承受的犧牲雖作為戰果被記錄，但僅以彰顯功績的形式呈現。除中國籍撰稿人的文章外，完全缺乏從侵略或加害視角進行的反思。換言之，無論撰稿人的政治立場與身份屬性如何，在已刊載的文獻範圍內，同時代日本觀察中國的視角中全然不存在戰爭犯罪的概念。^②

（本文由國家一級翻譯袁舒翻譯）

（責任編輯：廖媛苑）

① 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東京：番町書房，上卷1964年/下卷1965年；東京：翼書院，1968年；東京：夏目書房，2001年。

② 山根幸夫、藤井升三、中村義、太田勝洪編：『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東京：研文出版，1992年，第8章“日中戰爭”（石島紀之著），第313—362頁。